

人生著述，省略不去又结束不了

——写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出版之后

周 宁

—

译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3 月）出版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丝毫满足或兴奋，而是一种莫名的忧伤，继之而起的是沮丧，这种沮丧久久无法排遣，逐渐使我对生命与事业有了灰暗的印象。望着那 3 卷 9 册 5500 页的巨著，我甚至感到绝望。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如此巨大的篇幅、如此艰巨的工作，拉赫和他的助手似乎也只完成了他最初计划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我一时无从摆脱这种想法，但想得越深越久，又发现那种绝望感竟不知不觉地消退了。在学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在七天之内创造世界。任何一个人，只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环节，在特定的时间做一件具体的事，尽职尽责，然后便释然离去。就像那些修建大教堂的人，他们世代代修筑一座教堂，充满期望与感激，在闭上自己的双眼之前，谁也没有见到它完工。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发愿、研究、写作到出版，历时半个世

纪，拉赫在第一卷前言中说，他这项研究的念头萌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当时他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注意到所修课程大多是讲西方文化对世界现代化的影响，很少有人关注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欧洲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拉赫就立志研究亚洲对现代欧洲的影响，25年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出版，50多年后，才出到第三卷，此时，拉赫已经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60年前读大学时的一个学术念头，研究亚洲文化对现代欧洲的影响，竟耗去了他将近一生的年华与精力。《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于196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人们似乎并没有预见到它将成为一部“巨著”。第二卷分三册分别出版于1970、1977年。到1993年，第三卷分四册出版，《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已经成就3卷9册的煌煌巨著：第一卷《发现的世纪》：一、二册；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一册《视觉艺术》、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册《学术研究》；第三卷《发展的世纪》：第一册《贸易、传教、文献》、第二册《南亚》、第三册《东南亚》、第四册《东亚》。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书名暗示了全书的主题，即现代欧洲形成中亚洲的作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作用。拉赫关注的是观念史或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他的研究分两个层面：一是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包括这些知识实际获得与传播的方式以及知识的具体内容；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带来的影响，包括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观念制度的影响。当然，拉赫研究最初的用意不仅在描述“欧洲的亚洲知识”上，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证明一个被史学界忽略的事实：亚洲文化曾经启发欧洲的现代文明，并从思想、制度、艺术与技术上塑造了现代欧洲。

从整体上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研究框架是这样的：拉赫首先在系统的时空框架上全面考察了欧洲现代化早期亚洲知识的成长。在时间上，这种知识上的增长从中世纪晚期或蒙元世纪的大旅行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前，也就是从地理大发现到文化大发现；在空间上，

这种知识的拓展从南亚开始，逐步向东南亚、东亚推进，首先是印度，然后是马来半岛、中南半岛，最后是日本与中国。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拉赫试图将研究深入到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上，具体考察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思路纵横交错，第一卷考察了16世纪亚洲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与方式，第二卷分别从视觉艺术与工艺、文学与社会知识、科学技术与学术研究等方面，探讨欧洲的亚洲知识的积累与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第三卷沿着西方贸易与传教势力的推进，分别描述欧洲对亚洲不同区域——南亚、东南亚、东亚的知识状况。拉赫还计划写第四卷，具体分析亚洲不同区域国家“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影响”。

拉赫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过程，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对亚洲的影响，而是“发现”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本身的影响；他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文化方式，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对欧洲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而是观念与知识方面的影响。拉赫思考的是观念史或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他最初的研究动机中，似乎具有某种“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不仅欧洲促进、引导了亚洲的现代化，亚洲也曾促发、推动欧洲的现代化。

发端于古老欧亚大陆的近500年现代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代。面对这个大时代，不论探讨欧洲对亚洲的影响，还是亚洲对欧洲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价值在于，它试图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在世界现代化历史早期，亚洲文明对欧洲的崛起做出巨大贡献，这贡献不仅表现在物质与技术上，还表现在制度与观念上。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朗西斯·罗宾逊在评价这套书时说：“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是足以匹配并与它们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争辉的巨著。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也属于这类巨著。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也为新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与思想素材。”^[1]

二

拉赫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生逢其时又躬逢其盛。写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那些年，正值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58年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获得者毕都（George W. Beadle）、曾任美国联邦司法部长的李维（Edward H. Levi），相继出任校长（1961~1968、1968~1974），著名历史学家、《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任历史系主任，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等著名学者云集芝加哥大学，《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两册出版那年，即1965年，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杨联陞也相继受聘芝大历史系。拉赫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从事自己的研究，条件优越、学养深厚、视野远大、工作艰辛。

能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中，可谓幸福圆满。当年兰克因为卓越的历史学研究，获得了普鲁士贵族身份。在家族徽章上，刻着他的座右铭：“labor ipse voluptas.”（工作即快乐。）当年吉本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成14卷，耗时二十余载，著作最后完成时，吉本说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判了终生监禁的囚犯，终于获释了。然而，生命可有“可承受之重”，却不可有“不可承受之轻”，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完成6年以后，吉本就去世了。生命是需要事业支撑的，1993年，拉赫出版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3卷9册，7年以后辞世。

历史学界常能创造这样一些奇迹般的巨著，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兰克的《世界史》、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汤因比的

[1] Francis Rob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Cornell Universit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Review, in *History Today*, No. 30 (1996), June.

《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这些人将一生的心血投注到一项事业上，不问得失成败。有时候他们做成什么并不那么诱人，反倒是他们如何做，更耐人寻味。人应该有一个超越现世生命的宏大计划，这样可以克服短暂生命造成的虚无感；人生时间与精力有限，坚持做一件事，才会有所成就；而个人的成就，不过是超越个人生命的宏大事业的一个环节，这样人生才有天地广阔、时间悠久的历史，个人站在历史的队列中，只图获得一种永恒感。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研究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亚洲知识对现代欧洲的影响，试图改变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偏见，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它开启并构成 20 世纪后半叶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与社会理论，并为这种理论思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资源；二、在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领域的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思潮中，拉赫开辟了文化史或观念史领域，从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与文化影响方面“反写”“欧洲中心论”。

拉赫关注西方扩张在知识上的意义，从史识上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历史观念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一般欧洲中心主义世界现代化历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扩张的意义主要在欧洲对亚洲的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欧洲在亚洲的探险与征服，意义不在欧洲如何影响或冲击亚洲，而在亚洲对欧洲的反向影响或冲击。二、一般世界史或欧洲扩张史强调的多是经济、军事、政治与宗教的扩张，很少关注世界知识的扩展与文化的启蒙；这部著作关注的是欧洲人现代知识与观念的成长，尤其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亚洲的意义。首先，在观念层面，丰富的亚洲知识不仅使现代欧洲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其次，在实践层面，亚洲文化在器物、制度、观念上为欧洲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开创了一项艰巨而又意义非凡的事业，并为这项事业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在对现代

欧洲形成中亚洲知识的状况与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上，达到拉赫的广度与深度。拉赫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整理、阅读、解释的工作，他通晓十几种语言，查阅了西欧主要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的相关资料，游历了从北大西洋到南太平洋的许多国家，仔细阅读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他所完成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几乎成为相关研究的史料库。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开辟了一个深广的研究领域，启发了多层次多方向的相关研究。在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拉赫继承了兰克开启的史学传统，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考辨。拉赫还借鉴同时代风行的年鉴学派开辟的“新史学”，努力突破传统的政治史格局，侧重社会经济文化分析，将研究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体历史层面上；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文化史或观念史的研究。但拉赫在观念与艺术本身的研究上，并未达到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深度与高度，也没有对思想或观念本身的意义及其变革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语境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坦率地说，拉赫的贡献在“史实”不在“史识”，而仅此“史实”，已颇为不易。客观评价《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意义，它并没有提出一个前卫的学术观点或创立一个学派，而是完成了艰巨的史料梳理并开创性地提供了相关论题的全景式历史叙事。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一项耗尽个人生命、为整个学科奠基的事业。《欧洲形成中的亚洲》3卷9册的出版持续了近30年，研究则持续了近60年，从上世纪40年代拉赫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到2000年、2001年拉赫与克雷先后辞世。1993年第三卷出版后，克雷继续写作第四卷，按照拉赫最初的规划，《欧洲形成中的亚洲》3卷9册只完成了他预计研究内容的一半。第一卷导言介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研究的历史时段为1500年到1800年三个世纪，计划每个世纪用两卷的篇幅，一卷讨论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一卷探讨亚洲的知识对于欧洲的制度、艺术、工艺和观念的影响。从目前出版的著作看，第一、

二卷研究 16 世纪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三卷只研究了 17 世纪第一层面的内容，在第三卷第一册前言中，拉赫许诺将出版第四卷，具体分析亚洲不同区域国家“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影响”。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实际上没有写完。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内容越来越庞杂，篇幅越来越浩大，研究工作也越来越艰巨，原来拉赫一人独自担当的研究写作任务，从第三卷起，由拉赫与埃德温·J·范·克雷分担。克雷是拉赫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后来到加尔文学院历史系任教。原计划的 3 卷 6 册显然不能容纳研究的成果，到第三卷四册出版，《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已经成书 9 册，超出拉赫最初的规划，但在内容上只完成了拉赫最初规划的一半。拉赫原计划用六卷的篇幅研究 16~18 三个世纪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每一个世纪的内容占两卷，一卷介绍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一卷分析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结果用了 9 册的篇幅，也才写到 17 世纪末，不仅 18 世纪的内容未及论述，而且 17 世纪亚洲文化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展开。他们在第三卷的“前言”最后，又许诺计划中的第四卷，如果第四卷如愿完成，这套书的规模可能超过原计划至少一倍，但内容只完成一半。规划中 17 世纪至少一半的内容没有涉及，即使完成第四卷，也还没有进入 18 世纪。

20 年过去了，第四卷杳无音讯。拉赫先生已于 2000 年逝世，两年以后，2002 年克雷先生也去世了。2001 年我去美国，准备去芝加哥大学拜访拉赫先生，朋友告诉我他老人家刚在一年前去世了，我希望下次去美国的时候，有机会拜访加尔文学院克雷的故旧，从他们那里获得第四卷的消息。克雷教授的第四卷究竟完成了多少？或者，著作就像人生一样，总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仓促了结，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卑微的个人，你短暂的一生，究竟可以做什么？唯一能安慰我们的是，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人

继续拉赫与克雷的事业，也许已经开始，也许即将完成？

宏大的事业已经超出凡人生命所能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同时这种学术精神与功德也令人无比感动。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永生，学术是一条艰辛但安全的道路。我们通过小心翼翼的翻译，得以靠近这条道路，观看大师们庄严地走过，祈望他们智慧与尊严的荣光，多少可能折射到我们身上，照亮我们尘埃中的生命，给我们生活与工作的信心。

真正的学术是一项神圣而不朽的事业。